

高层决策内幕全披露 国家战略玄机大破译

中国高层

外交卷

王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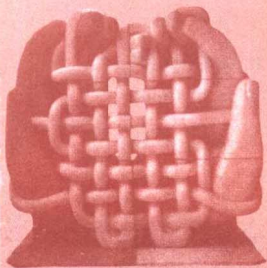
谋略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高层谋略

王昶 / 著

外交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869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层谋略·外交卷/王昶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

ISBN 7-5613-2194-5

I. 中… II. 王… III. 外交-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9677号

责任编辑：周宏

中国高层谋略 外交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邮政编码：710062)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2001年5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印张 字数：230千字

定价：48.00元(全二册)

本册定价：24.00元

ISBN 7-5613-2194-5/F·53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问题，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传真) 5233753 5307864

目

录

〃 〃

上 篇 谋略的风采 ——三十年来中国高层十大外交谋略

第 1 章 告别狂热，尊重现实	2
——走出极“左”和“左”倾的阴影	
中国外交决策层里的“左”派与极“左”派	
中联部长王稼祥被“凉”起来了	
周恩来险失外交控制权	
一度风雨飘摇的中国外交	
周恩来对外交界的“左”派势力进行清算	
外交高层领导确立毛—周体制	
道是春至犹有寒	

第2章 化敌为友、以和为贵 30

——突破中美关系间的藩篱

有点良心的强盗
权衡与分离
不得不为与恶性互动
不堪交恶的重负
和一国而众国从者，和之
下活全局的一着棋
尽燃心智化干戈

第3章 迂回包抄、欲擒故纵 70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源远流长的恩怨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中国声称应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
批亢捣虚，把美国凉在一边
告别“花果山时代”
一块脖子上的大磨石？一片广阔天地！

第4章 中国外交的邓小平时代 100

——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世界主题变了
决策层认清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两个平衡”限死了“一条线”
两不主义：“不上车”、“不打牌”
灵活运用“砝码效应”
“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深谋远虑的一大发明

第5章 海纳百川，为我所用 118

——促进对外经济交流

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

“洋冒进”碰壁

从“挽弓射箭”到“三全开放”

高层为对外开放而辩护

中国从二十年开放得到了什么

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

第6章 兼容并蓄，和而不同 137

——创造“一国两制”的政策

调和两制是以往迈不过的坎

一山可容二虎

兼容两制，一石三鸟

为什么是50年？

化解英国的三板斧

江泽民与海外媒体所称的“江六点”

钱其琛提“新三句”

第7章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158

——改革对外援助方式

耗去中国100多亿的“一盏明灯”

变“输血”为“造血”

1995年援外工作会议的决策

2000年“中非论坛”吹来的新风

陈云提出：接受援助无禁区

第8章 有所不为，为无不成

173

——确立后冷战时期外交的主攻方向

乱云飞渡，邓小平稳坐钓鱼台
各家事务各家管，别去争论
一人难称百人心，不要当头
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
邓小平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
小布什的TMD、NMD能吓倒中国吗？
“上海五国机制”与“10+3模式”的背后谋略
江泽民谋划国际新秩序

第9章 以合作求和平，结伙伴促发展

201

——实施构建伙伴关系的大战略

结盟的尴尬与对抗的惨痛
外交大战略的呼唤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支柱
“伙伴化”大国关系是新时代要求
各有所指的伙伴关系
大国伙伴关系的基本内核
朱镕基坦言：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10章 做个负责任的大国

227

——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国的名片上写什么头衔
撑起亚洲一片天
扑灭“中国威胁论”
人权外交：在反击中倡导对话
打起背包去维和

下 篇 谋略的延伸

——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可能出现的六大变化

第 1 种变化 集思广益，民主科学 248

——改革外交决策过程

本不需要神秘的外交决策

直接决定决策质量的智慧体系

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改革

第 2 种变化 防患未然，处变不惊 256

——提高外交危机处理能力

现代国家必备的外交危机管理机制

国际危机管理众家评说

影响美国外交的危机管理决策机制的变量

中美外交相关机制的差异

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机制的改进方向

中国高层化解中美撞机危机的六个高招

第 3 种变化 借台唱戏，得名求实 317

——突出多边外交的作用

全球问题要求多边解决

如何对待国际关系旧秩序

咬定联合国不放松

推进 APEC 中的合作

博鳌亚洲论坛预示：不会忽视 NGO

把中国办成国际会议中心

第4种变化 融入主流，尊重规范 331

——应对入世对外交的冲击

经济外交走向主席台

经济外交理念将有突破

经济外交在实践方面会有发展

经济外交机制将发生新的变化

外交风格会更加务实灵活

第5种变化 身居枢要，沟通四邻 342

——构建“三环沟通”的合作圈

江泽民说，中国坚定不移地面向亚太

钱其琛吹响合作的号角

东北亚合作圈：稳定局势，发展经济

中国—中亚合作圈：深化安全，促进经济

中国—东南亚合作圈：搁置争议，全面合作

第6种变化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353

——开掘国家的“软权力”

权力的第二个面孔

1992年北京申奥为何会失败？

江泽民直面“妖魔化”中国的媒体

“中华文化美国行”确立的模式

改进国家公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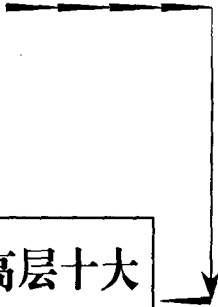
感染力也是国力

参考书目 371

上 篇

谋略的风采

—— 三十年来中国高层十大
外交谋略



第1章

告别狂热，尊重现实

——走出极“左”和“左”倾的阴影

要谈中国外交近30年来的谋略，就不能不首先谈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决策高层排除极“左”思潮和遏制“左”倾思想对中国外交事业的影响的行动。因为中国外交近30年来的辉煌成就都是在摒弃了极“左”思潮和“左”倾思想鼓吹的狂热理论，尊重现实，实事求是，客观地分析情况并制定相关政策的情况下取得的。

外交实践有赖于外交谋略的指导，而外交谋略则由外交思想而生发。指导思想是决定谋略的大谋略。如果外交指导思想发生方向性错误，那就是方向上的南辕北辙，外交谋略越高

超，其得出的外交成果离客观实际偏差越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外交决策高层开始意识到，如果不去排除极“左”思潮和“左”倾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就不能做到在制定和贯彻外交谋略时解放思想，也就无法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在实践当中犯错误，就会使我国的外交事业遭受损失。

在“文革”当中，极“左”思潮对中国危害极巨，其间中国外交也不能幸免。最严重的是在1967年和1968年间，当时造反派在极“左”派的指使下进行的“革命外交”极大的损害了中国外交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中国外交的无政府主义状况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外交就会陷入崩溃。

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即时醒悟，摆脱了林彪、江青等极“左”派的蒙蔽，依靠周恩来等稳健派人士的帮助，成功地在外交界肃清了极“左”思潮的泛滥，并有效地遏制了“左”倾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外交又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中国外交的这次纠“左”，为此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外交突破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国外交决策层里的“左”派与极“左”派

包括中国外交在内的中国各项事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受到“左”的影响和冲击。所谓“左”，就是指脱离客观实际，不尊重事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单凭自身的主观臆想或理论的条条框框去裁剪活生生的现实，强行要在主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实现

不切实际的目标的思想或行为。

“左”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是一种错误。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特点，中国曾一度出现认同“左”、崇尚“左”，认为“左”就是革命、越“左”越革命的不良思潮。这使得相当一部分中国领导人对“左”丧失警惕，不时陷入“左”的窠臼中，作出了危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情而不自知。这种思想属于“左”倾思想。

以毛泽东为首的许多中国领导人都曾犯过此类错误。就像邓小平后来在接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所说的：“由于胜利，他（毛泽东）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但“左”的思想和作风与极“左”思潮又是有区别的。

首先两者的拥护者和实施者不同：“左”的思想毛主席和党中央都在一定时期中犯过，而极“左”思潮则是特指林彪和四人帮等社会落后势力为达到自己小圈子的政治私利，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提出的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以借机打击党内和社会上的健康力量，以期实现自己把持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卑鄙企图的种种谬论。

其次，两者的内容不同，“左”的思想提出要“以阶级斗争

为纲”，国内工作和外交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开展；而极“左”思潮则提出要在社会各个方面都进行阶级斗争，斗争中要不择手段，要“打倒”、“炮轰”、“油炸”、乃至“从肉体上消灭”各种“阶级敌人”，尤其是与他们作对的“走资派”。而他们确定谁是“走资派”的实际标准就是是否从政治上拥护他们，顺其者则为“革命派”，逆之者则为“走资派”。所以极“左”思潮其实就是一种投机理论。鼓吹这种理论的人本身并不信仰它，他们只不过想找到一个可资标榜的旗帜和一根用来打击异己的棍子。

极“左”思潮是“左”倾思想与封建主义残渣余孽结合的产物，它将流氓无产者的不持中道、好走极端、激进凶莽与小农阶层的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结合在一起怪胎。拿来用于指导内政，则会引起全面内战，导致经济建设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综合国力下降，最终导致亡党亡国；拿来指导外交，则会引起外交纠纷蜂起，遭致国际主流社会的排斥，败坏国家形象，反过来又会阻碍国内各项建设的进行。

最先注意到并提出要对“左”的思想和极“左”思潮作出区分的是在1959年被“左”派打成“反党分子”的原总参谋长黄克诚，邓小平采纳了他的观点，认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分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在外交方面，“左”的思想表现在关于时代、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世界革命、和平共处、核战争、裁军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与和平运动等一系列当时对中国外交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上，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估计过于乐观，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认识不够，因此对战争和革命的估计过于乐观。“左”的思想排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裁军和缓和，鼓

吹战争，鼓吹输出革命，以意识形态而不是国家利益来定外交关系的亲疏。而极“左”的思潮则更狂热，它主张人为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四面出击，它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要以中国的狂热形态来塑造全世界。

中联部长王稼祥被“凉”起来了

“左”倾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在“文革”中体现最明显，但其影响的发端却早于“文革”。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大跃进”和国际共运中反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左”的错误。邓小平在后来谈到“大跃进”时说：“（这个错误）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受大跃进的影响，中国外交思想开始有盲目乐观的趋势，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

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中国不得不对国内经济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对外政策也随之出现变化的迹象。其明显的表现是，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对一个时期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检讨和批评。

1962年王稼祥经过与有关同志的多次讨论，写出一份政策建议信，作为党内通讯交给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信中他谈到中国要注意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具体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要避

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避免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在对苏问题上，要警惕赫鲁晓夫与美妥协，不惜与我决裂，因此，对苏要讲团结和反分裂，防止双方斗争升级；在中印关系上，要打开僵局。他认为中国在国际斗争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而不是毫不松动一斗到底。

1962年6月，王稼祥又向中央提交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的请示报告，提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外交政策的方针是：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不要对世界战争估计过高，“不要说必须在消灭了美帝国主义之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在强调人民战争的时候，也要充分估计到和平谈判的作用。和平谈判也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式”；“应当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角度出发，同情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对于那些在和平运动中只讲和平，不讲民族解放运动的人，我们应当首先同他们寻找共同点，不要简单地用大讲民族解放运动来同他们对立，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和平运动”。

王稼祥还主持提出《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提纲，坦言：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有些方面甚至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王稼祥的建议切合实际，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没有采纳他的合理意见。从王稼祥 1962 年下半年起不再主持中联部工作的情况来看，中国对外政策纠“左”的努力未能实现。1963 年以后愈演愈烈的中苏论战加剧了中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中的“左”倾错误，在关于时代、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世界革命、和平共处、核战争、裁军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与和平运动等当时对中国外交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表显得越来越片面和绝对化。

1965 年，中国高层第一次提出在外交上要“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中央采纳林彪的提法，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世界革命已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1966 年 8 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周恩来险失外交控制权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左”倾错误对中国外交的危害达到极致。这损害首先表现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外交界稳健派人物的地位受到挑战。

1966 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要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为了扫除这些障碍，《通知》要求：“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批判混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